



普希金新论

——文化视域中的俄罗斯诗圣

张铁夫 等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湖南省社会科学研究规划课题

I 512.064
Z181



普希金新论

——文化视域中的俄罗斯诗圣

张铁夫 等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普希金新论：文化视域中的俄罗斯诗圣/张铁夫等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4

ISBN 7 - 5004 - 4444 - 3

I. 普… II. 张… III. 普希金, A.S. (1799 ~ 1837) - 文学研究 IV. I512.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29752 号

责任编辑 罗 莉

责任校对 石春梅

封面设计 宗子斌

版式设计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3 传 真 010 - 6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2 插 页 2

字 数 286 千字

定 价 2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一

——“多元批评”的实验

夏仲翼

我将蜚声整个伟大的俄罗斯土地，
它现存的一切民族都将传颂我这个诗魂，
无论是斯拉夫人寿命骄傲的子孙、芬兰人、尚未开化的
通古斯人，还是草原之友卡尔梅克人。

我将世代代为人民所喜爱，
因为我曾用诗琴唤醒人们善良的心，
在我这严酷的时代，我讴歌过自由，
为那些罹难的人祈求过同情。

——普希金

人说诗人都有一股子狂气，普希金在他的诗里却始终念叨着“人民”，他说：“我将蜚声整个伟大的俄罗斯土地”，实际上他的名声却传遍了整个世界。中国，恐怕也算得上是普希金诗名远播的最大国家之一了。我们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虽然有着和俄罗斯十分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却十分友善地接受了这个欧洲浪漫

主义传统里出来的诗人，这本身就是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从1903年中国翻译《俄国情史斯密士玛丽传》（即《上尉的女儿》）以来，足足已经一个世纪，诗人普希金的名声日益增大。从最早的介绍、述评，到逐渐深入地进行研究。一百年来，中国可以说已经形成了相当规模普希金研究的态势。

中国的俄国文学研究是得天独厚的。因为从最早中国文化界的“以俄为师”，后来中国革命对俄国的借鉴，新中国时期对俄国全面的学习，都为俄国文学在中国的影响提供了广阔的天地。革命总是先天赋有浪漫主义秉性。浪漫主义诗人首先落入中国文化界的视野也是很自然的。普希金的作品在中国也是翻译得最完全的。单是文集已经有了好几个，至于单个作品的译本，更是风格多样，彰显着译者个性。这表明在中国有着雄厚的普希金研究的基础。研究工作至少要具备三个要素：首先是研究对象材料的完整，其次是研究人员良好的学识准备，最后是要有充分素养的读者或批评者。三者缺一都很难构成研究的良好基础。因为没有完整的材料，只是空中楼阁，外表好看的热闹；没有好的研究人才，更是一切无从说起；而成熟的读者尤其重要，没有成熟的读者，或者说批评者，研究会变成放任，因为它没有了鉴别、没有了辨析，也就没有了约束和交流。人文科学一旦少了鉴辨，往往会流为无用的空话，虽然表面像一个科学成果，俨然钜制宏论，斐然装潢，却是无用之物，于学术并无裨益。外国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多年来笼罩着一层迷雾，即作为学科的确定性显得不甚充分，其根源恐怕值得好好探索。

普希金专题经过这么多年许多专家的努力，已经走在扎实的地基上。学界不仅积累了比较完备的原始资料，多种译本；评传类、专题类、比较类的研究著作也不断问世。因为这是一个古典性的专题，不像某些带有显学题目的受人关注，所以反倒有

一些孜孜矻矻的学者，多少年来在一处耕耘，做出了不少成绩。

中国的文学研究是有传统的，它十分讲究基本功力。凡研究一个作家，通常是先练编纂年谱、校勘版本、细读文本的苦功，然后再作出自己的研究，一篇文章像一块炼石，蕴敛着爬罗剔抉、火炼冰淬的功夫。很多人受不了那个辛苦，往往就中途转行了，因为单是通过一定的理论视角，写一些生发出来的文字，终究要容易得多。外国文学行里肯这样做苦功的学者也是有的，只是不像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已经形成一种传统而已。我熟悉的张铁夫教授就是其中之一。

我最早认识张铁夫先生还是 20 世纪 70 年代末，那时文化禁锢甫开，外国文学研究重新开始。后来接触多了知道他正潜心于俄国大诗人普希金的研究。多年之后就收到了他的专著《普希金的生活与创作》，把诗人的生平、年谱、创作与社会等各个方面都作了详细的梳理。后来又隔了多年，读到他的《普希金与中国》和译作，偶尔也看到发表在刊物上的文章，多半是围绕着普希金这个专题。我当时很欣赏他的研究工作的程序。一是因为外国文学研究和其他人文学科一样，最终都是有指向的。即使是欣赏审美型的研究，它也是一个指向。通常我们是为了中国才去研究外国，不管学者有意还是无意，最终都会走向比较。所以我一直有一个十分幼稚不化的看法，外国文学研究中叫不叫比较文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研究就定然有比较，这时的功力却全在对所研究对象的深入详尽的把握，并不在外在有多少装饰或文章写得如何洋洋洒洒。因为任何研究其实都是一种“对话”，都有它内在的参照文本，或说参照系，外国文学研究的参照系当然首先是中国自己的文学，同时也包括其他国家的文学，如果对所研究的和所参照的对象并没有深入的把握，研究必然流于空泛。研究

工作首先要求扎实的专业素养，没有这一点，任何研究都是做不了的。对于这样的研究程序的欣赏还有一个原因是：研究都要把大量的原始资料，这是一种很艰苦的劳作，但作为成果的著作却又未必会为一般的爱好型的读者所欣赏，不会有太大的轰动效应。然而，它对学科或专题的建设却有实在的好处。后来我看到他一篇题为《学位论文与学术创新》的文章，才知道他正是用这样的程序在培养研究生，可见这是很有思考的一种做法。对照现在有些研究生导师，一人带上几十名研究生却见不到对学生基本功的培养，实在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现在张铁夫先生带着他的研究生们又完成了他设计的第三部专著：《普希金新论》。一个经典作家如何出“新”？会不会是原来水平上的重复？我带着疑问审视着这本新书的格局。它的副标题是：《文化视域中的俄罗斯诗圣》。论及了普希金的“人民性思想”、“自由理念”、“死亡意识”、“伦理指向”、“女性观念”、“圣经情结”、“叙事艺术”等七个问题。细看论证，原来不仅关联着不同的批评视角，并且都与当代的文化问题有着联系。这是一种现代性的解读。这七个方面，不一定能得到学界完全的认同，因为其中的确包括了一些各家各说的问题，但此书的认真程度，它的治学方法，对普希金创作特有个性的观察和批评的角度，无疑是十分值得注意，而且有价值的。中国对于批评，特别是文学批评，长期以来有一种似是而非的看法，好像批评代表了被批评对象的价值判断。所以总要把批评放在作品之上，很长时间里批评成了作品的尺度。其实这是最大的误解。对于好的作品来说，批评再好，也无非是“一得之见”。文学要包容批评，批评却无法包容文学。但批评却能揭示隐含在文学现象中真正有价值的部分。在俄文里说“В свете чего”有着昭示、烛照的意味，英文里说“In the light of”，也许都包含着这一层意思。《新论》用文化的

视角从七个方面来解读普希金，让普希金作品中过去尚未阐释清楚的问题轮廓鲜明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书中所谓的“学理问题”，其实有着相当的现代性，十分有益于理解诗人对当代的价值。

在俄国文论界，从19世纪起，“人民性”一直是一个不断变动着的概念，在苏联时期，成了文学批评的一个基本范畴。我国文论界也长期沿用并扩大化。本来是一个特定社会历史阶段和特定民族文学里形成的文学批评概念，在当时的苏联和我们的文论界泛化为一个十分不确定的概念，以至形成了游离在传统欧美文论之外的一个特殊术语。所以有些专家们宁可用“民族性”一词来替代它，出现了理解上的歧义。在《新论》中，作者用普希金作品的事实来说明这个术语当时应用的本义，这是一种很具体而实在的方法，至少在理解普希金作品方面有着确凿的说服力。术语在文学批评中只是一种操作符号，一切符号的背面都关联着文学的事实，纯概念化的操作很容易把批评和研究引入歧途。记得在80年代的中国颇有一些更新术语的呼吁。结果是旧桃换了新符，唯一的变化是文学批评的文字让越来越多的人看不懂了。表现极端的更成了一种术语游戏。操作符号的更新并不能为对象增加新的内涵，文章是显得新而奇了，读者却被搞糊涂了。文学批评和研究是对文学现象和事实的阐释，不能只是术语的演练。《新论》为了“人民性”这个术语，引用了大量的文学事实，分析了社会历史的语境，“人民性”在普希金创作中的涵义就具体化了，而不单是一个单纯的术语。为了说明文学的概念，这样的方法是可取的。至于“人民性”还是“民族性”，作为一个翻译问题，仍是可以从讨论得到解决的。

其他如对“自由理念”的阐释，从欧洲文化的渊源上，强调它是一种个性生命意识，是对俄国文化精神的反思等等，不再局

限于对农奴制度的批判上，突破了流行的所谓“批判现实主义”的局限，显示了一种欧洲文化空间的规模。在本书中，普氏作品中的“死亡意识”的精神探索本质，是论述得很精彩的部分。这个题目，在我国的研究中往往语焉不详。同样的还有“圣经情结”问题。其实这在俄国作家中，有着不尽相同的存在形态。不妨说，俄罗斯文学从总体上都摆脱不了对宗教和圣经的关系。而且其中还掺杂了斯拉夫民族东正教的特色。这在一定的时期里是忌讳的话题，《新论》涉及了这个题目，对理解普氏的作品也是至关重要的。

从全书看，这是一种多元批评的应用，语涉“多元”常常会引起一些关注，其实多元现象在 21 世纪已是个不争的事实，在文学评论里更是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世界都走向了“多元”的格局，文学中难道还会有这样的禁区？在文学批评史上，两千多年间出现过那么多的批评思想和流派，它们都是对特定文学现象的阐释，批评从来没有处在一种指导的地位，从来没有一个作家是按某种文学流派的主张来进行创作的，也从来没有一个批评家或者批评流派真正左右着创作的进程。倒是作家创作的群体效应，会引导批评提出某种文学主张。所以“批评指导创作”的想法，多半是一种误解，或者把批评对创作的要求看作是创作按照批评在发展了。我们文学史的叙述中常常会流露出这样的观念。其实最好的批评，也只是对文学现象最好的解释。在这个意义上，批评永远尾随在文学现象的后面。另外，之所以说多元批评是一种合理的存在，还因为历史上，批评史上还从来没有过一种流派或主张是真正能君临天下，统帅一切，真正有能力阐明一切文学现象的。文学是条大河，批评家、研究者只是作一瓢饮而已，谁又能揽大江于怀，指点激流的去向呢？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是一种“多元批评”的实验。这是很引人

注目的特色。

铁夫兄几十年来围绕着一个专题，默默地开掘，几十年的耕耘，不仅出来一本比一本扎实的著作，为后人的研究铺砖添瓦，还培养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的研究生，在我们这个普遍心态浮躁的社会里，真是难能可贵。他要我为他的新著写一段话，我却信手录入了这么多不甚相干的文字。但既然感觉是这样，我就如实写上。当然文责是绝对自负的。

2003年1月5日

序 二

谢尔盖·福米乔夫*

1999年，俄罗斯境内外举行了普希金二百周年诞辰纪念活动。尼·瓦·果戈理早在诗人生前就曾憧憬过这一时刻：“普希金是俄罗斯精神的一个特殊的现象，也许还是惟一的现象：这是一个高度发展的俄罗斯人，这样的人，也许要过两百年才能出现。”^①我们要指出，这一预测里使用了“也许”这两个谨慎的字眼……

众所周知，就连普希金的民族意义也远非一下子被认识到的。^②直到1880年，当诗人的第一个纪念碑在莫斯科揭幕并举

* 谢尔盖·亚历山大罗维奇·福米乔夫，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文学研究所（普希金之家）教授，语文学博士，俄罗斯科学院普希金委员会学术秘书。——译者注

① 尼·瓦·果戈理：《关于普希金的几句话》，见《亚·谢·普希金·赞成与反对·俄国思想家和研究家评价中的亚历山大·普希金的个性与创作·文选》第1卷，圣彼得堡，2000年，第70页。

② 大家知道，19世纪30年代批评界开始谈论普希金才能的“衰退”问题。对此，E.O. 拉里奥诺娃正确地指出，“19世纪30年代初期普希金最重要的文学活动多半是隐秘的，连对最亲密的朋友都秘而不宣。诗人的创作在成为公众讨论的对象时跟批评模式对不上号，不符合广大读者的期望。普希金的许多同时代人大概逐渐

行庆典时,^①在希望进行根本的立宪改革的短时期内,——用列夫·托尔斯泰形象的话语来说,即当俄罗斯一切都翻了一个个儿和一切才刚刚开始安排的时候,它才被认识到。在普希金纪念碑揭幕庆典的众多演说中,出自戏剧家亚·尼·奥斯特罗夫斯基之口的一句话大概是最明智的,却不知怎么没有引起注意,这句话是:“通过普希金,一切能变得聪明的都正在变得聪明。”(着重点为笔者所加——谢·福)

俄罗斯文学(不管是黄金时代还是白银时代的文学)一直是以普希金为标志成长和发展的。然而,在普希金时代,由他的天才孕育的整个俄罗斯文化在西方只被看成是一种异域文化。十分明显,在俄罗斯和“邻近的外国”境外,现在普希金的读者要少于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读者。有人认为,其原因在于他似乎是“不可译的”。比方说,请看伊琳娜·苏拉特在普希金诞辰二百周年纪念活动之后写的一篇文章中的一个论点:“在俄罗斯境外,普希金是不被承认,而且大体上是不被理解的,普希金是一个纯粹的民族现象,他的作品实际上是不可译的,只有在民族语言的环境中才可以理解。对于其他民族来说他似乎被列为禁忌,就像民族和宗教的圣物被列为禁忌一样。莎士比亚没有民族性,而普希金却有。这对我们的天才没有任何贬损——对我

形成这样的印象:诗人跟他同时代的文学‘步调完全不一致’,而且其间的差距在无可挽回地扩大。当然,如果说普希金‘落后于’时代,那是可笑的,问题也不在于他‘超越了’时代。很简单,他像一切真正伟大的艺术家一样,不再依从于它。”(E.O. 拉里奥诺娃:《1831—1833年普希金和他的读者》,见《生前批评中的普希金·(1831—1833)》,圣彼得堡,2003年,第24—25页)

① 对这次活动最全面的分析请参阅莱维特·马库斯·C.:《俄罗斯的文学政治与1880年的普希金节》,伊萨卡;伦敦,1989年。俄译本:莱维特·Ч. 马库斯:《文学与政治:1880年的普希金节》,圣彼得堡,1994年。

们来说，这正是他的特点和价值。”^①在我看来，这种意见是错误的，但遗憾的是，这一意见流传甚广，它似乎把问题变得极为简单。不过，实质不在这里。普希金当时没有像歌德和拜伦那样成为世界思想的主宰者：在当时的欧洲，俄罗斯作家一般还没有被真正接受。然而，如果说在西欧国家，普希金的名字至少在他生前就已经为人所知，那么在东方，这种了解的最初迹象则是在19世纪末。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所知的第一部普希金作品是《上尉的女儿》，它出版于1883年，书名为《俄国情史，又名花心蝶梦录》。二十年后，戢翼翬将这个版本译成中文，书名为《俄国情史斯密士玛丽传》。这大概不是偶然的。一旦某个国家对俄罗斯发生兴趣，首先拿来的便是蕴含着全人类共有的巨大冲突的历史长篇小说。就《上尉的女儿》而言，就是能够压倒纷争和社会骚乱的爱情的胜利（《战争与爱情》——1956年，波埃曼的《上尉的女儿》的缅甸语译本用的就是这样一个书名）。

普希金当时没有成为文明世界的“初恋”，那么两个世纪之后他能否被接受呢？人们认为，这取决于普希金创作的激情本身。他那追求“各民族忘却纷争，联合在一个大家庭”的时代的和谐的才能，是21世纪所需要的。国外的人文科学已经接近于这样的观点。

然而在俄罗斯常常能够听到这样的怨言，说什么世界上迄今对普希金的重视仍然不够。之所以有这样的怨言，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普希金的名字在当代本国文化中受到了十分广泛的推崇。这取决于进行这种推介的五种强化手段。它们是：

——出版（普希金作品及有关他的书籍的出版）；

① 伊琳娜·苏拉特：《普希金纪念活动是对历史的诉求》，见《新世界》2000年第6期（该文又载《莫斯科普希金学家》第9辑，莫斯科，2001年）。

- 教学（中小学和高等学校教学大纲中的普希金）；
- 博物馆；
- 各种艺术门类（音乐、戏剧演出、电影、雕塑、彩色画、线条画等）中的普希金；
- 各种大众传媒手段（期刊、无线电广播、电视、因特网）中的普希金。

为了说明这些手段多么有效，我只举出几个数字。20 世纪 70 年代自由征订的《普希金文集》三卷集一次的印数就达 1070 万册，普希金纪念碑总计有三百多座（在诗人诞辰二百周年的那一年，他的纪念碑出现在巴黎、维也纳、华盛顿）。^①每年有数十万人参观的普希金博物馆，在俄罗斯和邻近的外国就有十多座（这样的博物馆在斯洛伐克也有一座，不久前在纽约也建立了普希金博物馆）。关于普希金作品移植成音乐作品的规模可以根据恩斯特·施特克的出色的手册来进行判断（遗憾的是，其内容近从来没有更新）。^②正是通过音乐演奏，普希金早已在事实上登上了戏剧舞台，因为享誉世界的俄罗斯古典歌剧首先是依据普希金作品的题材创作而成的。

正因为如此，普希金的名字每天总是以某种身份在俄罗斯人的耳际萦绕。如果“要求”外国做到这一点，至少是有失分寸的。重要的是，上述手段即使强度小得多，但却自然而然地到处在起作用，这一点在上述例子中多少也已经提及。在这一方面应该特别强调人文科学的作用。

① 参阅 А.Д. 格达林、Г.А. 德罗维尼科夫、И.Л. 波佩柳赫尔：《亚·谢·普希金的纪念碑：附有简介的目录资料》，载《普希金委员会会刊》第 25 辑，圣彼得堡，1993 年，第 74—92 页。该文也记述了三度兴建的上海普希金纪念碑的复杂遭遇。

② 恩斯特·施特克：《普希金与音乐》，莱比锡，1974 年。

在纪念普希金诞辰二百周年的那一年，国际学术会议的范围是非常广阔的。举行学术会议的有北京、斯坦福大学、耶路撒冷、巴黎、罗马、威尼斯、维罗纳、米兰、雅典和大阪。法国、以色列、意大利和美国出版了会议论文集。^①多年来，特别是德国、日本、北美的普希金学会定期出版自己的学术著作，^②成绩斐然。我们还要指出由普希金之家和威尔士亲王主持的商业领袖论坛根据真迹复制出版的普希金手稿本，^③它使全世界学者现在能够深入到诗人创作时复杂的内心世界的秘密之中。

这一切有助于使普希金作品的译本日臻完善。尼古拉·扎波洛茨基曾经指出：“翻译家面前有两个秤盘：一个属于作者，另一个属于译作的读者。在两个秤盘保持平衡的情况下，译作才是出色的。”^④然而，什么是平衡的先决条件呢？是万有引力定律。而译作的等值性是以文艺作品的全人类内容为基础的。

各种类型的艺术都要按照美的法则对材料的外形加以改变。雕塑家的材料是大理石，作曲家的材料是声音，画家的材料是颜料。作家的材料是语言，它既能表现大理石的坚实，又能表现声音的抑扬，还能表现正在绽放的玫瑰的最娇嫩的色彩。语言是万

① 《普希金全集》，巴黎，斯拉夫学院，2000年；《亚·谢·普希金作品中的可兰经与圣经》，耶路撒冷，2000年；《普希金的欧洲》，威尼斯，2001年；《俄罗斯文化史资料与著作》第7辑（斯坦福大学普希金学术会议，1999年），莫斯科，2001年。

② 《阿里翁·德国普希金学会年鉴》；《日本的普希金学家》；《普希金学刊·北美普希金学会会刊》。

③ 亚·谢·普希金：《手稿本》，圣彼得堡；伦敦，1995—1997年，第1—8卷。

④ H. 扎波洛茨基：《翻译家手记》，见《翻译的技巧》，莫斯科，1959年，第251页。

能的，它的使命是团结人们，但它却使各民族产生异化。“诗歌创作的悲剧就在于此”，翻译大师之一的 M. 洛津斯基说道：“全人类的内容却只有诗人用其语言写作的那一个民族，还有懂这种外语的那些人才能理解。其他伟大的艺术——造型艺术和音乐——没有民族语言的界限，而最古老的、也许还是最强大的艺术——诗歌——在异国却成了哑巴。”^①

文艺作品在译成别的语言时，为了保存同一个意义，要进行技巧性的符号替换。然而实际上在这里发生相互作用的不仅是词汇，还有在每种语言里都得到鲜明表现的整个文化。理想的翻译不是不由自主地掩盖丰富的声韵的回声，而是对话。不是作家（他已经“听不见了”）和译者的对话，而是两种文化的对话，因为操不同语言的读者在此之前视为“哑巴”的那种文化应能做出回答，应该变得明白易懂。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克服世界文化界限的现代趋势有利于这种对话。

因此，针对操不同语言的读者出版普希金作品的特殊版本是非常重要的。在一些专集中汇集普希金对某一国家的各种艺术师承关系和言论是有益的。当然，对一个外国读者来说，某位天才如何接受他的文化，他大体上不会不感兴趣，——尤其是普希金，他对世界各国文化都作出了反响。^② 在这里，每个细节都很重要。例如，不久前才确定了在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

① M.П. 洛津斯基：《诗歌翻译的艺术》，见《翻译——民族亲近的手段》，莫斯科，1987年，第92页。

② 普希金藏书室里的很多书籍是普希金对中国怀有浓厚兴趣的确凿证据。比方说，这里有1818—1824年全套《西伯利亚导报》，该刊经常刊登有关中国的各种资料。

金》的草稿中得到反映的一个史料,^①该书保留了未完全定稿的几行诗:

[孔夫子] 中国的圣贤

教导我们尊重青年

[为防止他们迷途

不能急于加以责难

只有他们肩负着希望

使希望……]

现已十分清楚,孔子的《论语》一书所表达的这种思想,普希金可以从 II. - III. 列维克的袖珍本^②中汲取。

诗人对中国的广泛兴趣在 M. II. 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的学术著作中首次作了勾勒。^③这一课题得到中国的俄罗斯语文学家们卓有成效的深入研究,张铁夫的很有分量的专著《普希金与中国》就是以此为研究对象的。

可以预料,将来人文科学著作的作用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将会持续不断地增长。Д. С. 利哈乔夫院士正确地指出:“随着读者文化修养的提高,他们越来越力求窥探作者意愿的内幕,深入被作家写作意愿藏匿、不让读者看到的创作‘秘密’中去。当代读

① C. A. 基巴利尼克:《普希金与儒学》,见《第六届普希金与世界文化国际会议资料》,圣彼得堡;辛菲罗波尔,2003年,第36—43页。

② 《古伦理学文集》,日内瓦,1782年,第2卷;《孔子的伦理思想·他的生活及关于中国人哲学的论著,勒韦斯克编译自拉丁文》第129页。

③ M. II. 阿列克谢耶夫:《普希金与中国》,见 M. II. 阿列克谢耶夫:《普希金与世界文学》,列宁格勒,1987年,第314—350页(初次载于《普希金与西伯利亚》一书,莫斯科;伊尔库茨克,1937年,第55—92页)。